

论经济发展中的若干辩证关系

潘熙宁

经济发展的快与慢，效果的好与差，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试图通过对经济发展中几对关系的分析，提出一点辩证思考。

发展与改革：在国际斗争日益激烈，国家经济实力逐渐成为决定国际地位的重要法码的今天，加快经济发展是我国的必然选择。“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国力增强了，什么都好说了，但是改革与发展是当今我国经济的两大主旋律，这两者既可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一方面，经济发展会为改革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各方面的承受力会增强，有利于推进改革。正如小平同志说的：“在整个改革过程中要保持有较好的发展，只要生产有较大发展，改革的风险就会小得多。”另一方面，如果发展速度太快，反过来又会延缓改革的进程。一是在经济过热，总量失衡，人心惶惶的情况下，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1986年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进行的价格闯关就是一个例证。二是经济过热，可能形成卖方市场，不能为企业提供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同时掩盖体制矛盾，企业因缺乏压力，而不会产生改革的紧迫感。三是经济改革牵涉到利益格局的调整，往往需要为利益受损者提供某种形式的补偿，如发展过快，因为较多的财力物力用于支持增长，化解利益冲突的能力不足，可能阻碍改革。因此，想在高速增长中推进改革是不切实际的，到头来不但会延缓改革进程，反而会因为改革太慢，不能解除体制的障碍而制约经济的发展。在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时，必须把加快发展的立足点放在深化改革上，以改革促发展，这既是十多年来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今后处理两者关系的基本原则。

然而，近年来在经济领域中出现了放松改革，甚至以发展代替改革的倾向，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单纯抓速度、上规模、搞开发，改革无暇顾及。很多地方热衷于开发区、股票、房地产，而对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根本不去触及。如有的地方开发区挂牌半年，领导班子却因开发区的级别问题迟迟不能配齐。这几年农业的徘徊实质上也是改革停滞不前的反映。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生产在改革的推动下于1984年上了一个台阶。此后农村改革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而承包制又不能一劳永逸，所以导致农业的长期徘徊。二是以发展为名，进行违背改革方向的改革。企业改革的方向是通过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但是很多地方以发展为借口，利用行政特权强行组建集团公司，变着法子干预，限制甚至收回企业的自主权，使企业成了二级法人。三是出于加快发展的需要，进行急功近利的改革。在改革中不注意能够产生长期效能的改革，而只是着眼解决当前问题，不注意改革成果的巩固和消化，而是一味地闯关。往往导致前一项改革成果成为后一项改革的对象。

当前，必须提高对改革会极大地促进发展的认识。要看到，这十几年来，我国经济之所

以能够发展得这么快，关键得益于改革经济领域所带来的生机与活力。同时还应看到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效益低下、重复建设、盲目开发、活而无序等等问题依然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管理体制来解决。因此要充分利用现在经济环境相对宽松的有利时机，从实际出发抓住发展中的主要制约点，确定改革的重点和主攻方向，一抓到底，抓出成效，使改革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经济的紧密联系是任何一个阶级社会的共同特征，政治与经济的不解之缘随着阶级的产生而出现，也只有随着阶级的消亡才能最终消失。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建立，为中国找到了一条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发展道路，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无可辩驳的事实。然而，相当长一个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唯政治化的倾向，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把政治与经济隔离开来，对立起来，搞空头政治，一事当前，总是用政治标准来衡量、规范、评判，对经济生活及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普遍规律人为地添上政治色彩，抬手动足，往往先要问一声姓“资”姓“社”。这实际无异于给经济活动带上一个“政治枷锁”，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甚至窒息。改革前的几十年，我们的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长期在温饱线上徘徊。所有制结构是适合政体要求的单一的公有制，管理体制是适应政治目标的变化而变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分配制度是符合传统政治理论的绝对的平均主义。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在政治统一性的规范下削足适履，失去了生机与活力。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经济生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政治桎梏，但是经济活动中的政治化倾向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经济服从或迎合政治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一是经济改革计划常因政治需要而搁浅。如1992年初轰轰烈烈的破“三铁”改革就是出于政治上考虑而偃旗息鼓的。一方面打破“铁饭碗”与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的传统政治规范是严重矛盾的。再者担心失业工人上街游行，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得不半途而废。这就是出于政治需要而放弃有利经济发展的改革计划的典型例证。二是经济活动常用政治手段来推动。如前几年在全国城乡广泛开展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就是一例。在社教的指导思想中，各级都明确提出，抓社教的目的是促改革、促发展，引导人民奔小康。本来这纯粹是经济活动，却偏以“社教”这种政治运动形式来推动。在实际工作中，一些乡村往往打着社教的旗号或平调劳力或强制农民改变种植计划，改革前甚至六、七十年代的一些作法在农村重又出现。三是经济组织行政化。表现为经济组织按规模大小比较政府部门确定行政级别，领导者则依行政级别的高低享受不同的政治经济待遇；经济组织具有双重身份，兼有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经济组织处于政府附属物的地位，没有被视为一个经济组织；经济组织有明显的行政隶属性，按严格的行政隶属关系实施管理等等。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经过漫长的比较和选择并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近些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表明，这种体制下政治与经济完全可以相辅相成，相互推动。其中关键就是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实行适当的“政经分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大胆借鉴和利用人类社会所共有的文明成果。为此，一方面要继续解放思想，不要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纠缠不清，思想解放天地宽，只有思想解放，经济发展才能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要抓住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点对政治体制进行大胆改革，彻底根除经济发展中政治篱笆的体制根源。

速度与效益：速度与效益是经济发展中长期围绕我们的一对矛盾，八十年代我们没能解

决这个问题，九十年代仍然没有走出效益不高的困境。1992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2.8%，工业增长20.8%，但效益改善的幅度与经济增长加快的速度极不相称，财政收入这一综合反映经济效益的指标只增长3.5%。据此，有人提出当前存在着经济过热现象，应该紧缩银根，控制速度。

控制速度就能提高效益吗？实际上问题远远没有那么简单。一方面，经济发展速度太低，不但能源资金潜力发挥不出来，而且改革会遇到很多阻力，转换机制、优化结构等深层次问题无法解决，效益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是速度效益型经济，没有一定的速度，固定生产成本无法降下来，效益当然高不了。更为重要的是，速度过低会带来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过低的速度无法实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番的目标。二是过低的速度无法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据测算，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至少要在5%以上才能保证财政收入的增加，单是满足每年新增1500万人口和原有人口的生活需求，就需要国民生产总值增长3个百分点。

有鉴于此，在速度问题上能快还是要尽力而为，尽量快一点，不要人为压低速度，限制发展。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反复告诫我们，“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邓小平同志强调的速度是以提高效益为前提的，所追求的速度是有效益的速度。这样的速度起码有如下五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速度的增长是靠发挥现有生产潜力取得的，不能靠高投入、靠扩大基建规模、靠大量铺摊子实现的；二是速度的增长是在各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不存在比例严重失调，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高度紧张等问题；三是速度增长的同时经济结构也不断优化，没有出现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引进；四是产销率与速度同步增长，没有出现积压与滞销；五是质量普遍提高，产品合格率和优质率与速度同步增长，只要真正作到了以上五点，速度应该是越快越好。

热与冷：由于经济发展的周期规律的作用，发展时期有冷热之分是正常的。但是暴热暴冷、乍热突冷又是不正常，应该尽量避免的。我国经济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经常大起大落，波动的幅度和频率都是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所罕见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起落是人为控制的结果，不是市场规律和经济规律使然。

总结多年的经验和教训，在对待冷与热的问题上必须注意三点：一是要用两点论、两分法分析问题。全局经济过热(冷)，不等于全国各地皆热(冷)。如当前房地产热主要是热在沿海，据建设部统计，全国50%的房地产公司为广东、海南、福建、上海、江苏5省市所拥有。1992年，全国房地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17%，其中海南增216%，广东增211%。而一些内陆和边远省份，房地产才刚刚起步。因此解决问题不能重犯“一地得病，全国吃药”的老毛病，而应该区别情况，该冷的用“冰镇”，该热的用“火烘”，不能因为怕过热而使该热的升不了温，也不能因为怕过冷而不让该冷的冷下来。二是热的时候，心要热但头脑要冷。越是热，越要保持冷静，不能急功近利，操之过急，一哄而起，随波逐流。热的时候要冷静务实，要以科学的态度，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发现、解决苗头性和倾向性的问题，防止大起大落。工作中要有热情，但又要头脑冷静。三是冷的时候，不能心灰意冷。越是冷的时候，越要多讲热话。冷中孕育着热，冷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升温。因此，要在低潮中准备高潮，一旦大发展的机遇到来，便可以快步启动，趁势而上。华夏第一县—江苏无锡县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他们有正确的冷热观有关。1990年、1991年当全国经济处于低潮时，

ECONOMIC REVIEW

经济
评论

1
1994

本刊被评为湖北省优秀期刊

前多,而是与周围的人相比,自己碗里的肉不如人家多、不如人家好,甚至自己吃肉,别人吃山珍海味,于是气不顺,不吐不快,放下碗就骂娘。因此,要加快发展固然必须下大力气破除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所谓的公平,但是在竭力追求效率目标的同时,又必须把握好分寸,防止过了头,走到公平的对立面。一旦地区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过分扭曲,就会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进而导致剧烈的社会冲突,所以在发展中不能一味追求效率,而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但是我们绝不能放弃效率来追求公平,而应该在追求效率的前提下,采取措施保证公平。如政府通过税收、调节个人收入,通过社会保障为穷人提供生活资助,通过适当的财政政策扶助落后地区的发展等等。

优势与劣势:经验表明,一个地方经济能否快速发展,是否有后劲,关键取决于该地有没有优势、优势发挥得如何。近几年来,很多地方致力于挖掘潜在优势,大力宣传优势,充分利用优势,终于走出一条从发挥要素禀赋优势到形成经济优势的发展路子。但是也有不少地方,盲目地把资源与优势划等号,结果走入了优势的“误区”,不但没能形成经济优势,反而白白浪费了资源。因此,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应该对优势进行重新认识,树立起适合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新的优势观。

首先,必须看到,优势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过去被视为优势的东西,在今天也许就成了“昨日黄花”。很早以前,木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唯一能源,对于资源丰富的山区来说,无疑具有绝对的优势。但随着煤和石油的掘出,木柴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已无足轻重。而电特别是核电的广泛应用,煤和石油的优势也相对逊色。在不久的将来,风能和太阳能的普遍推广,电能也许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再向前发展,新的优势能源很有可能取得霸主地位。这里面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是优势不断异主的决定性因素。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优势地位受到严重挑战的不独自然的能源。随着高分子及复合新材料的相继问世,天然原材料的优势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随着立体交通网的扩展,地球实际在相对缩小,所谓的交通和区位优势也不是自我炫耀的资本;随着无土栽培生物工程新技术的应用,地大物博也不值得自豪和陶醉。

其次,必须看到,优势往往与诸多劣势并存。优势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正因为劣势的存在,才衬托出某种优势。在优势的背后,伴随的往往是致命的劣势。如人口过多往往素质低下,国营大中型企业都往往机制不活,水运便利往往灾害频繁,资源丰富往往交通不便等等。交通不便不单是物流不畅,实际上还意味着信息不灵、观念落后、文化荒蛮,而这往往是经济发展的致命弱点。

再次,必须看到,优势利用不当就会转化为劣势。最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导致经济的封闭性。曾经很长一个时期,我们津津乐道于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万事不求人,关门搞建设,为原材料能够自给而陶陶自乐。结果国门洞开之日,我们却惊奇地发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明显地扩大了。那些资源贫乏的国家,却一个个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日本没有铁矿,钢铁和汽车却行销全球。飞机一起飞就进入别国领空的弹丸之地新加坡,既无矿藏,又无农田,甚至连修机场的土石都从别国进口,但它却在短短十几年间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二是导致生产的外延型扩张。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地取材,就地加工”思想指导下,一些地方资源加工型企业遍地开花。普遍存在着规模小、装备差、竞争弱、效益低等问题。三是导致经济发展以资源的高耗为代价。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实际上是依靠资源的巨量甚至超量投入来获取的。以1985年与1953年比,国民收入增长9倍,而能源、铁矿、有

色金属的消耗却分别增长14倍、24倍和23倍。四是导致生态的恶化。由于资源的过度开采，往往带来土地沙化，平原退化，江河湖泊淤化，水质恶化等一系列生态不平衡问题。

因此，发挥优势除了坚持以科技为先导、市场为导向以外，必须把优势的发挥建立在劣势改革的基础之上，要抓住劣势作文章。一方面，劣势不改变，优势发挥不出来。很多地方所以怀抱金山仍然拿着金饭碗要饭，关键是由于劣势的制约，资源优势无法转化为商品和经济优势。如因交通不便，不少地方资源的开发困难重重，即使开发出来也是代价高昂，效益很差。另一方面，在劣势上作文章可以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一个浅显的道理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一只长短不齐的木板拼成的木桶，其容量是由最短的木板所决定的，一条宽窄不同的道路，其通过量是由最窄的部分决定的。我们不必加长所有的木板，不必全面加宽道路，只要改善其中最薄弱的部分，桶的容量就可以大幅度增加，道路的通过量就会全面加大，经济发展亦然，只要找准劣势，抓住关键制约点作文章，一定可以事半功倍。

物质与精神：在改革和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不但是当前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而且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实践问题。在过去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我们离开了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搞建设。在大跃进的岁月里，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当作真理来宣传，“文化大革命”中又盛赞“精神原子弹”的巨大威力。甚至提出了“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等荒谬的口号。精神的作用被不适当地夸大，被抬到了超越物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其实，对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早有精辟的结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对此，邓小平同志也曾敏锐地指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人类发展的历史也告诉我们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能够生存下去，才能去从事政治、理论、科学、艺术等精神生产和精神活动，而生存的先决条件是通过经济发展取得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资料，然后再去创造精神财富，建设精神文明。放眼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激烈竞争的当今社会，经济利益越来越成为维系国与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主要纽带，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主要动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我们正确处理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把人们对社会、国家的贡献与应得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城乡广泛采取了联产承包、工效挂钩、按劳取酬等物质刺激措施，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经济建设取得了有口皆碑的喜人成就。

但是，近几年来，很多地方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物质的作用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精神的作用被贬低甚至被忽略。一事当前，开口言钱，闭口思利。“金钱万能论”，“有钱能使鬼推磨”等论调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不少企业职工出现了给一分钱出一份力等现象，主人翁的责任感丧失殆尽。由于一味地讲究物质刺激，结果胃口越来越高，生产每况愈下。社会上，因为没有钱而见死不救等咄咄怪事也时有耳闻。给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蒙上了另一层阴影。

实际上，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都要有一点精神。谁都不会怀疑日本是一个讲究物质利益的国家，但是少有人看到日本的崛起与其大和民族精神同样密不可分。资本主义国家和企业重视企业文化、企业精神的比比皆是。历史和现实都启迪我们，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以此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

（责任编辑 程镇岳）